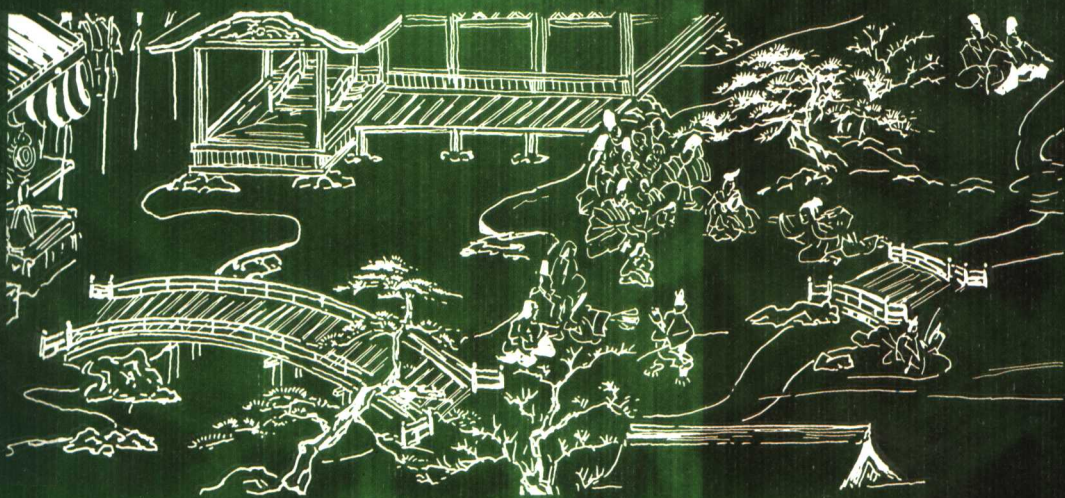


文化论丛 王其亨 主编

建筑文化论丛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张十庆 著



TU986.631.3

天津大学出版社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张十庆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 张十庆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5

(建筑文化论丛 / 王其亨主编)

ISBN 7-5618-0476-8

I. 作… II. 张… III. ①园林设计-研究-日本 ②作庭记-译文 ③作庭记-注释 IV. TU986.6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406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风和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网址 www.tjup.com

电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70mm×240mm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

印数 1-3 000

定价 27.00 元

责任编辑 张文红
装帧设计 谷英卉 吴 葱
技术设计 油俊伟

SPY/60/03

建筑文化论丛

已经出版

- 在投影之外：文化视野下的建筑图学研究
- 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
- 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
- 不同自然观下的建筑场所艺术：中西传统建筑文化比较
- 《作庭记》译注与研究

即将推出

- 风水理论研究 1（第2版）
- 风水理论研究 2
- 中日建筑之比较研究
- 丝绸之路与华夏建筑

序

《作庭记》是日本古代一部造园专门著作，其时约当日本藤原时代（894—1185）后期。作者不详，有谓为“橘俊纲”（1028—1094）。此书在日本造园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很受日本学界重视，历来考证、注释者甚多，中国学界也早知此书。已故建筑学家童寓先生生前多次指出《作庭记》的学术价值及其中表露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热烈期待它的中译本的问世。很遗憾，在他1983年逝世之前，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作庭记》不仅是理解日本造园特色、形成源流的钥匙，并且还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国造园手法的佐证。日本造园往往更多具有象征手法和宗教（主要是佛教的禅宗、真言宗和密宗）色彩，这或许是中国造园史上缺失的（或受忽视的）一环。以往我们目光囿于文人园，这是为现存遗物实证和文字书画资料所局限而致。事实上中国的寺院禅庭，不乏林泉清幽、萧疏淡泊的环境情趣，散见于史籍咏篇者亦复不少。这同样是有待发掘整理的宝贵遗产。

张君十庆，现为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成员，曾于1988年赴日本爱知工业大学留学一年有半，受业于日本古建权威浅野清教授门下。留日期间，遍访各地名胜古建筑址，阅读文献，收集大量资料，以为从事中日两国古代建筑文化交流的研究准备，其中包括对《作庭记》的研究准备。他于1989年归国，在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后，仍留校继续从事东北亚建筑文化研究，随即进行《作庭记》的译和注。译与注，即文字翻译与内容研究，二者相辅相成，无研究即不可能真正达其意。读者从译者的大量注释中可见他用功之深、力求使读者易于理解的用心之切。经张君的辛勤努力，虽不能说这译本已臻尽善尽美，而是期待读者批评指正之处甚多。但我认为至少可以说，这篇译本已颇具可读性，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了。

一事之成，来之不易。或可以此告慰童老在天之灵。是为序。

郭湖生

于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1992年1月25日

目 录



序	
上 篇	《作庭记》研究 (1)
	一、《作庭记》的意义与价值 (2)
	二、《作庭记》的内容构成 (6)
	三、《作庭记》的作者、系谱与年代 (10)
	四、《作庭记》的历史背景 (14)
	五、《作庭记》的文化源流 (32)
	六、《作庭记》与寝殿造庭园 (38)
	七、《作庭记》的造园技术 (47)
下 篇	《作庭记》译注 (67)
	卷上 (68)
	一、立石要旨 (68)
	二、立石诸样 (76)
	三、汀形诸样 (82)
	四、岛姿诸样 (83)
	五、立泐次第 (86)
	六、落泐诸式 (92)
	七、遣水事 (94)
	卷下 (103)
	八、立石口传 (103)
	九、立石禁忌 (108)
	十、树事 (116)
	十一、泉事 (120)
	十二、杂部 (124)
插图目录	(125)
参考文献	(128)
后 记	(129)

上篇

《作庭记》研究

一、《作庭记》的意义与价值

《作庭记》是一部形成于日本平安时代（781—1185）后期的造园技术书。其内容广泛而全面，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平安时代后期日本寝殿造庭园的形式及其造园技术，可以说是日本造园发展至平安时代后期，其技术的积累与总结，是日本乃至东亚造园史上，关于早期造园的一部最为重要和珍贵的文献。作为东亚造园史上最早的一部造园技术书，《作庭记》有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自从中国的造园随佛教的传播进入日本之后，日本全盘地接受了中国的造园技术，成为东亚造园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并在唐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其造园至平安时代趋于成熟。这是日本造园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成书于平安时代后期的《作庭记》，正是这一时期日本造园走向成熟的产物和反映。《作庭记》所反映和代表的这一时期的造园技术，构成了日本古典造园的传统，成为其后日本造园发展的一个基础和源泉。庭园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和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最显著和典型的特征。以《作庭记》为代表的日本古代造园文化，典型地反映了奈良至平安时代日本文化的性质、特点及背景。在这一意义上，《作庭记》是日本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和象征。

日本在中世（1184—1572）之后，尤其是在近世（1573—1867），又陆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造园书，在诸多造园书中，《作庭记》不仅年代最早，而且最具价值。自平安时代后期《作庭记》出现之后，再未出现过可与之相比拟的优秀之作。《作庭记》自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不但影响了其后的造园实践，而且对后世造园书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作庭记》能够流传至今，也充分显示了其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近代以后，《作庭记》的意义与价值，日益为日本所珍贵和重视，尊为国宝。《作庭记》的研究，随之也成为日本造园史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研究日本造园史者，没有不读《作庭记》的。日本学者认为，《作庭记》反映了日本古典造园的精髓，是日本造园传统的基础与象征，并就《作庭记》的意义与价值指出：作为日本造园之传书，《作庭记》具有最高的价值（森蕴《作庭记的世界》）；即使称《作庭记》是古往今来世界庭园艺术的金字塔也不过言（同上）。也有评价指出：《作庭记》才称得上是世界最早的造园专书（木村三郎《作庭记新考》）；《作庭记》可称为造园之经典，日本庭园技术的至宝（斋藤胜雄《图解作庭记》）。《作庭记》成为日本造园史研究的经典文献及基础史料。早已湮没的日本早期造园的面貌，正是通过《作庭记》及相应的考古发掘，才逐渐得以认识。日本造园史上造园技术与风格的演变和发展，也正是借助于《作庭记》的研究，才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可以这样说，对于认识和理解日本造园的性质与特色，《作庭记》是一个关键。

在日本,关于《作庭记》的研究,不仅限于造园界,在历史学、建筑学、美术史等各个领域中,亦极受关注。1976年英译本《作庭记》的出版,更使得《作庭记》为世界所知。我国学界亦重视《作庭记》的意义与价值,童寯先生在其《造园史纲》中论及《作庭记》“乃东方最早造园文献,书中分论山、石、池、岛、植栽、建筑,杂以阴阳五行、佛教,兼散布迷信之说”。

作为东亚造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造园对于中国造园史的研究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而言,历史上中日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注定了中日造园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意义上,《作庭记》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中日造园比较研究的最直接和重要的史料。另一方面,从中国造园史研究自身的角度而言,这种比较研究,对于中国造园体系的全面、整体的认识,也极具意义与价值。其不但有助于认识中国造园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影响和发展,同时借助于对域外从属于中国造园体系的造园史研究,反过来对中国本土造园史的进一步认识和解明,也大有益处。中日造园史的比较研究,当属中国造园史研究上的重要一环。在这一意义上,《作庭记》对于中国造园史(尤其是早期)的研究,是一重要的参照和补充,《作庭记》的研究,应视为与中国造园史研究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中日间文化关系的性质与特点,学者们早就指出二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日本从隋唐时代直接输入中国文化以后,历宋、元、明、清,凡是中国的学术文化、技术风俗,或迟或早,没有不复演出现于扶桑三岛的。所以日本文化学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延长”^[1],造园文化也同样如此。

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造园,两千年来,其发展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然留存至今的多只是些明末清初以来所营造的园林,代表和反映的也仅是造园史上晚期的风格。故今日我们所能直接见到和了解的我国园林及其风格,仅是中国古代造园发展长河中很小的一部分,反映的也只是古代灿烂造园艺术的余晖,远远代表不了造园发展的全貌,尤其是反映不了我国早期造园的技术与风格。两千年来中国造园的发展,前后风格的演变甚大,故若仅以明清园林所反映的晚期造园风格去推测早期的造园,则势必导致偏颇。遗构的湮没,史料的缺乏,使得对早期造园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成为中国造园史研究上的难点及薄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若放眼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造园体系,尤其是通过中日造园的比较研究,则必有所获益。因此,对于中国造园史的研究而言,日本早期的造园技术书《作庭记》以及园林遗构,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正如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现存只有明清的园子,也已经变了样子。而日本园林可以让我们想像出中国宋园是什么样子,所以是对中国园林史的一个极好的补充”^[2]。其实何止今人,古人早就想通过日本来获得和认识中国本土已失传的文物礼仪制度^[3]。中国古代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正说的是这个道理。

与两千年来丰富多彩的造园实践相比,中国古代造园技术与理论的总结,则显得苍白。即使有那么一些只言片语,也多是依附于画论、山水文学或园记等。从传世的

著述看，直至明末，造园理论也始终未形成完整、成熟的独立形态。若不是明末借文人造园家之手，才有惟一的一部造园书《园冶》传世，那么在完整、系统和独立的造园理论这一领域上，几乎就成为空白。中国古代造园实践丰富，而技术书缺乏这一独特现象，或许由于早期专著甚少，未得流传；或如明人郑元勋所云：“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4]这一解释倒也切中造园的本质，同时也表明中国古代造园书之著述与流传极鲜。然造园也并非完全无成法可行，无规矩可依，《作庭记》与《园冶》的出现正表明了这一点。若论造园艺术，与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断不需作为范本以供后人临摹的园谱之类，来断送造园艺术生动活泼的生命，但若论具体的造园技术，有那么一些关于其成法、规矩的技术书，也未必就会束缚了造园艺术的创作，如《作庭记》与《园冶》中许多关于技术内容的记述。

作为造园书，《作庭记》与《园冶》本身的存在及流传形式，亦有所不同。历史上《作庭记》以秘传书的形式流传，而《园冶》则公刊于世。因此，两书的内容及性质，亦随之带有相应的烙印与色彩。《作庭记》中所存大量造园禁忌内容，当与其秘传书的性质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说，其秘传内容应主要是关于禁忌内容，而《园冶》虽成于风水禁忌盛行的明代，却表现出明显排斥禁忌的倾向。此外，两书在文体及气质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园冶》骈俪行文，典故连篇，辞藻华丽，充满文人画士的情调与趣味，而《作庭记》则没有那么文气和雅致，尤其是其禁忌一类的内容，更显粗俗。以历史的眼光，我们很难去判别《作庭记》与《园冶》的高下之分，然二者的雅俗之别，则是十分明显的。就两书时代而言，《园冶》所处的明末，毕竟已是造园史的晚期，其总结的也只是明末造园的技术与风格。相比之下，较《园冶》约早五百年的日本造园技术书《作庭记》，则显得格外珍贵，从而成为中日早期造园史研究的惟一直接文献史料。

《作庭记》与《园冶》作为不同时代的造园书，各有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若仅从文献史料的角度而言，《作庭记》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造园技术的本身，有一个承前启后、不断积累的发展过程，若以后代造园的眼光求之于前代的《作庭记》，则当然会有差距。但《作庭记》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能为我们提供多少于今可行的技术内容，其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作为史料的历史价值。故对其价值的衡量与评判，应建立在历史、文化的标准之上，而不宜以绝对的技术价值来衡量其相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也是衡量《作庭记》在东亚造园史上的意义与价值的标准与角度。

《作庭记》不但在造园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作为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的积累及造园理论的总结，也影响和指导着日本现代造园的创作与实践，成为日本造园师必读的课本。《作庭记》的造园思想培育和启迪了现代日本造园的创作，成为日本现代造园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源泉。日本现代的造园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运用着《作庭记》的造园思想和方法，其影响于日本现代造园中随处可见。

从《作庭记》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在以《作庭记》为代表的古典造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成为日本现代造园的一个重要特色。也由此,日本现代的造园,颇具成就而广受赞誉。

对传统造园精髓的汲取、运用及创新,同样也是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现代造园的必由之路。因而,《作庭记》对中国现代的造园实践,亦具借鉴和运用的价值,无论在造园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指导。《作庭记》精辟的造园思想及成熟和丰富的技术手法,对于现代造园的创作与实践,无疑也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注 释

- [1] 梁容若.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2] 冯纪忠. 人与自然——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的趋势. 建筑学报, 1990;(5)
- [3] 中国逸书, 日本多存。宋代欧阳修《日本刀歌》诗曰: “徐福行时书未焚, 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 举世无人识古文”(《欧阳文忠公全集》, 卷15)。
- [4] 《园冶·题词》。值得指出的是,《园冶》逸书的再发现及其完整版本的整理出版, 都曾得益于该书在日本的流传, 并经由现代日本造园界的推崇而反馈到国内学术界, 参见陈植《园冶注释·序》,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

二、《作庭记》的内容构成

根据《作庭记》异本《山水抄》的记载可知,《作庭记》是在橘俊纲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編集而成的,并且根据《作庭记》中作者的自述:“延圆阿闍梨者,得作庭立石相传之人也,予又得以传其文书”(“立石禁忌”篇),可以推知,在《作庭记》成书之前,似已有一些有关造园作庭的秘传书之类的底本存在。再根据《作庭记》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其中还收录了许多口传、秘诀以及一些相关的文化内容,因此《作庭记》的内容构成,带有某些汇编的痕迹,正如编著者所言:“不论善恶悉记之”(“立石禁忌”篇)。相应地,《作庭记》在体裁结构上,也显得并非十分严谨、完整和有序,如出现前后内容略有重复等现象。

《作庭记》原文,在构成上未设独立的目次,全文在结构上亦无明确的篇、章节的划分,然其整体的内容构成,依所记述内容的不同,甚明确地分成若干篇,且各篇头,大都设有与其内容相关的提示语、句。依此,《作庭记》整体的内容构成,大致可划分为12篇,每一篇记述的内容不同,分量也各异。《作庭记》的原文,因是以日本假名文字杂以部分汉字构成,故这里以原文的行数^[1],来表示各篇内容的分量,并以此分析其内容构成的特点以及各篇在整体构成上的轻重详略。《作庭记》12篇的内容及其所占行数具体如下所示:

第一篇	立石要旨	98行
第二篇	立石诸样	63行
第三篇	汀形诸样	7行
第四篇	岛姿诸样	48行
第五篇	立泐次第	67行
第六篇	落泐诸式	44行
第七篇	遣水事	118行
第八篇	立石口传	57行
第九篇	立石禁忌	157行
第十篇	树事	60行
第十一篇	泉事	67行
第十二篇	杂部	7行

谷村本《作庭记》分上、下两卷。卷上从第一篇至第七篇,计445行;卷下从第八篇至第十二篇,计348行。上、下两卷共计12篇,793行。正文之后,另有跋语4行。

从以上12篇目提示的内容可以看出,《作庭记》的内容构成相当丰富,但其文字

量并不算多,以行计算,总共也不过793行,以译文的字数而论,约14 000字左右。然《园冶》正文内容的文字量,亦不过15 000字左右^②。故《作庭记》与《园冶》在文字量上相差无几,大体相当。而在内容构成上,尤其是造园的技术内容,《作庭记》较《园冶》更加广泛、深入和具体。这反映了《作庭记》内容构成上的重技术的倾向和特色。

就各篇所占行数的多少而言,第九篇“立石禁忌”的内容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其次是第七篇“遣水事”。造园禁忌内容所占比重如此之大,表现了以《作庭记》为代表的早期作庭秘传书的一个重要性质与特色。此外,由篇目所表示的内容构成可以看出,《作庭记》的造园技术,与所谓的“立石”关系密切。这表现了《作庭记》造园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即以“立石”为中心,强调“立石”作为作庭之基本的特色。

《作庭记》12篇的内容,相当充分地反映了早期造园的主要内容,几乎涉及了造园作庭所有的重要方面及其基本要素。就其造园技术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理石、理水及植栽这三个方面,而独未专门论及建筑。《作庭记》所表现的早期造园,对建筑的形象及其在造园上的景致作用,似未作刻意的追求,人工的建筑与自然的山水,也并未完全地融为一体。在《作庭记》中,建筑并未成为与山、水、植物并列的造园要素之一。

在所论及的造园内容方面,《作庭记》有较《园冶》更为详尽和全面之处。如关于造园理水,《作庭记》所论极详,而《园冶》所论却不充分。《园冶》偏重的是掇山叠石,而《作庭记》于理石、理水这两方面,皆甚为注重。《作庭记》的造园内容,基本上就是以理石与理水为骨干而展开的。以下就其各篇内容,择要略述于下。

第一篇“立石要旨”,如篇名所示,主要论述造园作庭要旨及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所谓“要旨”,指的是篇首所列举的三条作庭最基本的原则。这三条对于作庭之重要,的确称得上“要旨”。第一条可以说是作庭的指导方针,其精神就是因形就势,因地制宜,师法自然;第二条阐述的是作庭既要以传统为范,又要尊重主人的需要,同时还要有自己的风格;第三条强调的是造园作庭应博采众长,择善而从。这三条要旨,把握了造园的本质,堪称古往今来造园作庭的要旨,是《作庭记》造园理论的概括和体现。该篇中其余的内容,则是较具体、详细的论述,主要记述了南庭的设置及其大小的权衡、池中筑岛的方法、岛上乐屋的设置及方法、拱桥架设的位置关系以及作庭理水的测平技术。此外,关于池中立石的处理、中岛岸石的立置以及庭池泄水的方法等,也皆为宝贵的作庭经验之谈。

第二篇“立石诸样”,实际上论述的是作庭诸样,即以庭池表现自然中诸水体的形象与意境,从而形成相应的大海样、大河样、山河样、沼池样及苇手样这五种庭池形式,此为《作庭记》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该五样中,以大海样最为重要,列于诸样之首。关于诸样的形象与做法,文中所论甚详,且表现形神兼备,颇有趣味。

第三篇“汀形诸样”,是《作庭记》十二篇中分量最小的一篇,仅7行,但其内

容却相当重要。所谓“汀形”，即岸与水的交界轮廓，也即水际线形，它实际上表现和反映的是水体的形象。文中论述了尖如锄锋、凹似锹形的汀形的设计与处理，反映了将汀形设计作为造景内容之一的特色。

第四篇“岛姿诸样”，是关于池中筑岛及其岛形的论述。池中筑岛历来被视为园中第一胜景，在《作庭记》中也同样是最为重要的造园内容。文中将岛形依其性质、形象、特征等分为十种，即山岛、野岛、杜岛、矶岛、云形、霞形、洲滨形、片流、干潟及松皮，并论及其岛形与做法。岛的类型若大而分之，可成两类，一为山岛，一为平岛。《作庭记》岛姿十种中，前四种为山岛，后六种为平岛。山岛的构成，以土、石堆置；平岛的构成，则多是积沙为洲屿，其岛姿各具特色，别有趣味。就造园对象的形式及其相应做法，分类详尽、细腻，且能传神地把握和表现其特征，是《作庭记》造园技术的一个重要特色。

第五篇“立泷次第”，论述了作庭的另一重要内容，即瀑布的做法。其内容包括选石的要诀、叠石为瀑的方法及瀑布两种基本形式离落与传落的做法和特点，并就决定瀑布落幅的因素作了探讨，指出水落之幅惟取决于水落石的宽狭形状。最后描述了令瀑水远望犹泄出于山岩间而似有深境的方法。

第六篇“落泷诸式”，即将丰富的瀑布落式，作详细的分类归纳，并逐一述其形式的特点和做法。其诸式是：向落、片落、传落、离落、棱落、布落、丝落、重落、左右落、横落这十式。就前八式，所论甚详，而后二式，仅提及其名而已。此外，还论及了两点，其一，所作瀑布须面对月亮，以使水中映月；其二，将瀑布视为不动明王的化身，故瀑布之构石，须仿三尊之姿而置。

第七篇“遣水事”，是《作庭记》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所占分量，居诸篇第二。所谓“遣水”，即庭上流溪走泉，故此篇即关于庭上溪流的设计与处理，所论甚详，面面俱到。择其要者，如关于遣水水源的方位、“顺流”水系的配置，又引经据典，以五行说及阴阳说释之。在论述作庭的水、石关系上，以帝王、臣下的关系附会比拟，得出“凡作山水，必立以石”的结论。并规定了溪流的坡度以及提供了以剖竹仰置于地，流水其中，测定水路高下的简便方法。溪流弯处，受水冲击尤甚，文中论述了置石护岸的方法及布石的艺术。关于遣水浅滩湍流的形象设计与处理，亦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文中还论及了诸如遣水与植栽的配置、遣水幅广的确定等内容。此外，在无池之庭上，遣水即成为造园景致的主角，而有相应的处理方法。

以上七篇为卷上内容，自第八篇始为卷下内容。

第八篇“立石口传”，根据其篇名可知，即为作庭秘诀、口传的汇集，是丰富的造园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其内容主要包括理石的三个方面，即相石、布石及具体施工技术。相石是造园理石的基础，文中关于相石的记述，简明扼要地表达了相石的方法和特色。布石是理石技术的主要内容及精华所在，文中指出布石的原则在于整体上的顾盼呼应、相称协调，并就具体的配置形式，以象形拟物的比喻手法，作了形象生动的阐述。在具体施工技术上，详细记述了加固石根的逐层填土夯实的施工技法。

第九篇“立石禁忌”，与其他诸篇以技术为中心的内容构成相比，其注重的是诸如禁忌、禳解、符镇一类的文化内容，所占篇幅为诸篇之首，表露了《作庭记》作为造园秘传书的性质与色彩。所禁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方位禁忌、位置禁忌及反常规禁忌三方面。该篇中值得注意的内容之一是，在篇尾部分，作者探讨了人作山水与自然山水的关系并进行了比较，指出人作山水较自然山水的优越之处在于对景致可作取舍与剪裁，揭示了人作山水的本质所在，是《作庭记》造园理论的又一阐述。

第十篇“树事”，所注重记述的并不是树事的技术内容，而主要着眼于其文化内容，即强调庭植树在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于庭上各方位植以相应的树木，以为四神具足地。具体方法为，以九柳、七楸、九桂、三榆分别替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成相应的四神具足地。此外，还记述了门柳、槐门之说及其相应的文化意义。又以象形解字的方法，判定庭园环境形象的吉凶，亦为该篇的内容之一。

第十一篇“泉事”，论述了泉对于庭园居家之必要，即所谓“去暑以泉最佳”者（“泉事”篇）。本篇所论“泉事”，与其说主要着眼于造景，不如说更注重的是其实用功能，故所记述内容也皆为有关作泉的具体施工技法，如井泉的形式及其做法、掘槽引泉的方法、作喷泉之法、防止井筒泄漏的方法等等。尤其是其喷泉的做法，甚为别致。

第十二篇“杂部”，论述了楼、阁二者在形式上的区别，并指出其功能上的不同，即“楼以望月，阁以纳凉”（“杂部”篇）。

以上所述，即《作庭记》全书12篇的大致内容及其主要精神。通观全书内容，就理论、技术、习俗、经典等等，皆有详略不等的记述，其中不乏独到、深刻和有味之处。就其内容构成而言，技术内容与文化内容相映，理论阐述与做法描述具备，内容丰富而庞杂。然不难看出，《作庭记》的内容构成是以技术内容为核心与主体的。

作为参考，摘录《作庭记》异本《山水抄》（三卷）的各卷内容构成如下：

上卷：“立石子细”

中卷：“立泷流水次第”、“造作之事”

下卷：“立石口传并前栽等事”

其中，中卷的“造作之事”及下卷的“前栽事”为《作庭记》所没有的内容，其他内容则几乎与《作庭记》完全相同^[1]。

注 释

[1] 此处所论的内容构成，以谷村本《作庭记》为依据。行数的统计，参照了森蕴《作庭记的世界》一书。译文中的分段起行，依原文意思，略作有适当的调整、改行。

[2] 《园冶》的甚多篇幅，为图及所附题词、叙及序所占，其正文内容，也只不过15 000字左右。

[3] 见飞田范夫《作庭记からみた造园》。

三、《作庭记》的作者、系谱与年代

《作庭记》一书，未署作者姓名，故关于其作者无从直接了解。就此问题，从日本江户时代起，就有诸多议论，并曾一度认为，《作庭记》卷末跋语中提及的后京极殿（藤原良经）即为其作者，然诸多研究否定了此说。日本学者根据《作庭记》原文中作者的一段自述，即：“高阳院殿修造之时，能作庭立石者皆失，偶有招来之人，亦全不合心意，故宇治殿（藤原赖通）躬自筹画作庭。其时予常往之，得以详细见闻作庭立石之事”（“立石禁忌”篇），并以此作者自述为线索，结合历史上高阳院修造史实的研究以及《作庭记》异本《山水抄》的研究，得出其作者即为高阳院主人藤原赖通之子橘俊纲的研究结果。

橘俊纲（1028—1094），为藤原时代高官藤原赖通之子、藤原道长之孙。日本藤原时代（894—1185），在政治、文化上是藤原氏一族兴盛的时代，其鼎盛时期即为藤原道长当权之时。橘俊纲的祖父藤原道长（966—1027），立其女儿为皇后，自己作为外戚而摄政，独揽大权，由此迎来了藤原氏一族的全盛时代。1017年让摄政位于其子藤原赖通（992—1074），藤原赖通作为其后三代天皇的摄政、关白^[1]，维持着藤原道长以来藤原氏族的全盛势力。作为藤原赖通宅邸的高阳院，是藤原时代寝殿造宅邸庭园之重要者，代表着藤原时代造园的最高水准。而此高阳院的修建及藤原赖通亲自筹划作庭之事，在《作庭记》中的作者自述中，亦有提及。作为《作庭记》作者的藤原赖通之子橘俊纲，在此高阳院修建之时（1040年），年纪尚小，然随其父藤原赖通经常出入于营造现场，而“得以详细见闻作庭立石之事。”这种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对橘俊纲其后《作庭记》的著述，无疑甚为重要。

橘俊纲的一生，正处于平安时代的中后期，也正是寝殿造庭园成熟及兴盛的时期。作为其时上层贵族的一员，橘俊纲对这一时期的寝殿造宅邸庭园及其营造不仅有亲身的体验和感受，而且“尤好此道”（《山水抄》）。《尊卑分脉》称其：“号伏见修理大夫，水石得风骨”^[2]；《中右记》赞其伏见宅邸：“件处风流胜他，水石幽奇也”^[3]。由此可以想像橘俊纲对造园作庭的兴趣及才能。优裕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亲身的体验与感受，成为橘俊纲编著《作庭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关于《作庭记》的版本问题，现存诸本均为抄本或异本，原本不存。现存诸本中较主要的有谷村本、彰考馆本、群书类丛本及《山水抄》等。

在诸本中，以谷村本的年代最早。其卷末跋语中记有“正应第二”的年号，可知此抄本跋语年代为镰仓时代中期的1289年。该抄本明治时代以后为谷村家所藏，故称“谷村本”。此本为诸本中最重要者，日本昭和11年（1936）被指定为国宝^[4]。

彰考馆本，为彰考馆所藏之抄本。日本宽文12年（1672）由菊池东匀写成，题名